

# 作为中国陶瓷认知与表述范畴的“窑”

## ——一个知识考古的视角

赵利中

[摘 要] 陶瓷是华夏文明极具代表性的器物符号,其生成、播衍、流变的历史过程始终与土地息息相关。以“窑”为核心概念的中国陶瓷命名分类体系,是舆地类序政治空间格局和疆域地理思想在事物理解上的反映,是土地文明伦理的独特“人—地”关系在事物体认中的彰显。“窑”这一概念范畴的演变过程伴随着中国学问传统中地理观、博物观、格致观、道器观与近现代西方科学认知的对话互动,呈现出别具特色的陶瓷知识生产历史图景。

[关键词] 陶瓷;窑;范畴;地理观;知识生产

[作者简介] 赵利中,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博士研究生,福建 厦门 361005

[中图分类号] J5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4434(2019)04- 0143 -06

DOI:10.16524/j.45-1002.2019.04.012

陶瓷在华夏大地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是日常生活中人们最广泛接触和普遍应用的一类人工物。在人与陶瓷的互动中,在造物、体物的过程中,人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关于陶瓷独具特色的知识谱系和价值观念。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中国的陶瓷特别是古陶瓷的一大特点,就是以“窑”的所在地作为分类与表述的重要概念范畴,其背后的逻辑,正是对陶瓷“地方性”的彰显。此类表述始见于地理志书与文人诗赋笔记,并在后人的注疏、辑录中逐渐成为约定俗成的用法。时至今日,在与陶瓷相关的知识生产领域,“窑”也仍是人们理解、认知、把握、诠释这一物类时无法回避的重要概念坐标。

通常认为,制陶产生于相对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其原料、工具、场地以及制作者的生计都离不开土地。在中国,陶瓷的生成、播衍、流变的整个历史过程,都与“土”有着剪不断的关联,“窑”正是这种“人—地—物”关系的集中体现,这与西方陶瓷之间存在的明显割裂和二元区分有着相当不同的逻辑。对中国陶瓷而言,“土”的意义不仅在于塑其形,更在于赋其神——将根植于乡土社会的知识与价值体系加诸其上。以“窑”为核心的陶瓷

命名分类方式,体现了中国知识传统中的地理观、博物观、格致观、道器观与近现代科学认知的对话互动,形成别具中国特色的话语范式。

—

汉语中,“陶”“窑”二字同出一源。先看“陶”字,左为形旁“阝”,“阝”即“阜(阜)”,意为高大的土丘。《说文·阜部》:“阜,大陸也,山無石者。象形。”<sup>[1]</sup>段玉裁注:“《释地》、《毛传》皆曰‘大陸曰阜’,李巡曰‘高平曰陸’。謂土地豐,正名為陸。陸土地獨高大名曰阜,阜取大名為陵。”<sup>[2]</sup>右为“匚”,《说文·缶部》:“匚,作瓦器也。从缶。”<sup>[3]</sup>“缶”字甲骨文作“𠩺”,上为“午(杵)”,下为“凵(器)”,象以杵捣泥制作瓦器之形。而对于“匚”,学界有多种解读,或认为“匚”象人形,如金文“𠩺”,正似一曲身之人,执杵捣泥造器;或认为“匚”“宀”“穴”皆由同样的笔划演变而来,表土室土窟,“匚”“窑”皆为“穴中之缶”,既指陶器本身,也指烧陶的窑穴。除此以外,今日之“陶”还有另一字源,即金文中的“𠩺”或“𠩺”,会意字,左从“阝(阜)”,右为上下二人,或二人再加二土,会人在土丘上之意。《说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类)重点项目“中国特色艺术学体系研究”(17AA001);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越南民族文学与中国多民族文化研究”(14BWW023)

文》：“陶，再成丘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于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所居，故堯號陶唐氏。”<sup>[4]</sup>可见“𡗗”最初是用来指代与土丘相关的地名，亦特指先圣唐尧尝栖之所。大约自战国至秦汉，“𡗗”与“𡗗”逐渐合流，小篆始现“陶”之字形。

不难看出，考“陶”字之源，自然就会言及“窑”，二者不仅在符号发生上相关联，从经验角度来看，无“窑”不成“陶”也是一个常识性逻辑。“窑”，小篆作“𡗗”，形声字。《说文》：“窑，燒瓦窯竈也。从穴羔聲。”<sup>[5]</sup>小篆之“𡗗”看似与“甸(陶)”并无太多关联，然而从今日多释读为“甸”的金文“𡗗”“𡗗”“𡗗”，战国陶玺文“𡗗”“𡗗”，简帛文“𡗗”“𡗗”等字形中，可一窥其作为表意文字的演变脉络。事实上，在上古文字刻画和声音符号的使用中，“甸”“窑”常常不分彼此，二者不但笔画相通，发音相近，意义也往往混作一谈，未有严格区分。《诗经·大雅·緜》云：“古公亶父，陶复陶穴。”<sup>[6]</sup>《郑笺》注：“復、穴皆如陶然。是謂經之陶即窯字之段借也。”<sup>[7]</sup>《緜》正义引《说文》：“陶，瓦器竈也。蓋其所據乃缶部甸下語。甸、窯蓋古今字。”<sup>[8]</sup>可见“甸(陶)”“窯”存在相互假借的现象。从文字构型上分析，“甸”字当属于“复杂象物字”，在表现陶器的同时，一并交代烧陶的窑灶<sup>[9]</sup>。

通过以上字源考溯，笔者尝试作两点释读。一是从“陶”“窑”的同源关系来看，二者在发生学上指向同一物象，说明先民已认识到“窑”之于“陶”的重要性。《说文》中表“土器”的字可以按“未烧”和“已烧”分为两类，如“坏”“培(坯)”“𡗗”等为土器之“未烧者”，而“瓦”“陶(甸)”“瓷”为“已烧者”，烧与未烧，乃土至陶转化的关键，这种认知也体现在词语分类上。因而，“窑”中之“缶”，才成其为“陶(甸)”，“窑”即是“陶”。及至今日，汉语中以“窑”指“陶”的现象仍十分常见，比如把陶瓷业称为“窑业”，把从事陶瓷制作活动称为“窑活”，把陶瓷器皿称为“窑器”，把工匠称为“窑工”“窑户”等，不一而足。

二是从“窑”“甸”“陶”等字与“土”“阜”“丘”“穴”在符号意象上的关联不难看出，无论是陶器，还是烧制陶器的窑穴窑灶，都与土地有着天然的“血缘”，是人与土互动相生的产物。中国人认为：“木器液，金器腥。圣人饮于土，食于土，故埴埴以为器，天下无费。”<sup>[10]</sup>这种观念颇能说明土之于人的特殊意义。“土”既是制作器物 and 修建窑炉的基本原料，也是取土作陶、烧窑成陶的场所；既是人们从事生产生活的对象，也是依附于其上生

生不息的地方。《绎史》引《周书》言：“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遂耕而種之，作陶冶斤斧，爲耒耜鉏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助，百果藏實。”<sup>[11]</sup>这一上古传说将中国的农业始祖神与制陶活动联系起来。事实上，在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出现之前，包括制陶在内的手工劳动是与农耕文明相伴相生的，耕陶相伴、亦耕亦陶的现象可谓普遍。制陶虽是手工活动，却深植于土地文明伦理，凝聚着乡土中国几千年的创造、理解、智慧和经验。

## 二

前工业社会的手工劳动往往高度依赖资源、环境等地域性因素。《周礼·冬官考工记》曰：“橘逾淮而北为枳，鸛鹑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sup>[12]</sup>就陶瓷制作而言，人对土地的依附性就更为显著。《天工开物·陶埴》开言道“水火既济而土合”<sup>[13]</sup>，土是陶瓷的原生形貌，也喻指与制陶休戚相关的一方水土、风土。在建窑、烧窑等关键环节，更需要匠人善于顺应自然而为，“兼籍天时与地力，而人巧乃可施焉”<sup>[14]</sup>。从大的空间范围进行比较，北方黄河流域与江南丘陵山区有着迥异的水文、地理、气候条件和资源禀赋，约自战国早期便逐渐衍生出两大类十分不同的窑炉形制：圆窑（或馒头窑、马蹄窑）与龙窑<sup>[15]</sup>，而窑炉形制与烧成技术的差异又造就了陶瓷制品多元化的地方特色。

早期制陶业根植于农工相辅的传统，多以家庭、家族为生产主体，窑工亦是农人，农忙种田，农闲作陶，土地依附性使得乡土社会的流动性较低，生产活动囿于一定的地理范围。此外，从工匠“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的生成传播特点来看，亦能说明传统技艺具有较强地域性的原因<sup>[16]</sup>。

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陶、瓷同源，皆生于土。《说文》将“甸”“瓷”同释为“瓦器”。“瓷”字偶见于晋代诗赋，唐宋之后使用频率逐渐增加。北宋字书《类篇》收录了该字，曰“陶器之緻堅者”<sup>[17]</sup>。除此以外，清代之前的各类文献中几无更进一步说明界定。古人多以产地对陶瓷作分类命名，且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刻意区分“陶”“瓷”之间的差异，二者混用的情况十分普遍。这种认知所反映出的事实是：中国陶瓷是在人与土地的长期互动中、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不同的地域环境与人们的适应策略相结合，创造了纷繁多

样的陶瓷类人工物,其材质、工艺、风格、造型的丰富意义,远超陶/瓷二分法的界定。事实上,“瓷”之概念逐渐凸显并且与细腻、洁白、精致等义项构成明确关联,是相对晚近的语言现象,与16世纪以降渐趋频繁的东西方交往以及欧洲社会对于“瓷”的认知过程有着不容忽视的关系。

欧洲不少地区自古也有陶器制作传统,“陶”多被视为粗拙的日用品。当中国瓷器在十六至十七世纪传入欧洲后,这种“洁白、明亮、半透明和釉彩精致的东方器物”立刻被视为具有“卓越力量”的珍宝<sup>[18]</sup>,被与诸如贝壳、水晶、椰子等其他具有异国情调的物品一同置于“奇珍柜”(cabinet of curiosities)中陈列展示<sup>[19]</sup>。英语“porcelain”一词源自中古法语“porcelaine”,原指“cowrie shell”(一种贝类),“porcelain”明确用于指代“瓷器”大约始于16世纪中期。这一语义变化过程,除了可以用瓷器与白色海贝具有类似质感来解释,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二者同为“舶来”的东方事物,被当时的欧洲权贵阶层赋予了相似的身份彰显之社会功能。

随着近代科学革命的发生,欧洲人的物质观、卫生观也在悄然改变。瓷器所具有的洁白、光亮、坚硬、无孔隙、不透水、耐酸腐蚀等特性,与当时普通人家中常见的陶、木、白磁等材质器皿“脏兮兮、满是刮痕”的表面形成鲜明反差<sup>[20]</sup>。于是,使用瓷质餐具进食成为洁净、文明、高贵、优雅等“品味”的象征。若以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和莫斯(Marcel Mauss)“事物的分类再现集体等级秩序”之观点来看<sup>[21]</sup>,欧洲陶/瓷二元分类的背后,实际上附着肮脏/洁净、鄙俗/高雅、粗鲁/文明、落后/先进等一系列社会价值区辨,这一观念不仅在“陶”“瓷”间划清了界限,也极力否认“瓷”与“土”的原生关联,以至于到17世纪末,仍有许多欧洲人“坚持认定瓷器必定是某种稀有材质”,而“绝不可能是区区泥土”<sup>[22]</sup>。

在《韦氏大词典(第9版)》(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中,“瓷”(porcelain)被定义为“质地坚硬的、细腻的、(敲击时)能发出响亮声音的、无孔隙不透水的,并且通常是半透明的白色材质,其成份主要是高岭土、石英以及长石,经由高温火焰烧制而成”<sup>[23]</sup>。而“陶”(earthenware 或 pottery)则通常是“多孔隙的、不透明的、由粘土制作的、经由低温烧制而成的物质材料”<sup>[24]</sup>。英语中这样一个力求严谨的界定,正是为了在“瓷”与“陶”之间作严格的区分。

17世纪下半叶,中国瓷器大量运抵欧洲,在王

公贵胄的支持下,炼金术士及早期的化学家、物理学家、自然哲学家们,便开始在“金屋”和“实验室”中,借助燃烧透镜、熔炼炉、蒸馏炉、坩埚等设备,分析“瓷”的理化性质,试图揭开矿物转变为“真瓷”(true porcelain)的奥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制瓷术一直为权贵阶层所把控。

纵观瓷器在欧洲的“发明”过程,“瓷”这一事物,更像是在某种精英化的“本质”观念驱使下,近代实验科学与社会区隔共谋的产物,而窑炉在此过程中,则扮演了实验室设置的关键角色——为新技术、新材料的创制营造出反事实、理想化的“人工自然”条件。反观中国的情况,陶瓷产生于乡土基层的日常生活实践,烧窑过程所面对的是“天然自然”复杂多变的环境,“窑”身上集中承载了不同地方的人们与土地长期打交道的丰富意涵。这两种迥然相异的造物实践反映在认识论层面,便是中西方对于陶瓷认知、表述方式的巨大差异。汉语中的“窑”字通常有以下几种用法:一是指烧制陶瓷的窑炉、窑灶本身;二是借以指代陶瓷类事物;三是与陶瓷的产地(或兼有年代、风格)等特征相关的综合性概念范畴。这正是英语单词“kiln”所不具备的。

### 三

从表述方式上来看,中国陶瓷的一大特点,就是以“窑”这一明显具有“地方”指涉意味的概念范畴作为命名分类的基础。其背后的逻辑,正是中国人对于“人—地”关系的丰富经验和独特感受在事物体认上的反映。地理学者阿格纽(John Agnew)认为,地方有三个面向:区位、场所、地方感<sup>[25]</sup>。从字面上看,“窑”所标示的应该是烧制陶瓷所处的具体地点或位址,即“窑址”。然而从中国传统认知角度来理解,却并不尽然。彭兆荣认为,中国的“地方”首先是一个宇宙认知观,其“政治指喻远大于地理意义”<sup>[26]</sup>。

中国最古老的文献汇编《尚书》中有《禹贡》一篇,其核心思想便是借大禹治水之名,将九州山岳、川泽、田地、草木、物产,通过贡赋和贡道与一点四隩、九土五服的王朝治理空间直接联系在一起。《禹贡》开言道:“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sup>[27]</sup>正义曰:“九州之土,物产各异,任其土地所有,以定贡赋之差。”<sup>[28]</sup>《周礼·天官冢宰》中,亦有“九赋”“九贡”之治<sup>[29]</sup>。在这里,地方水土差异、田地肥瘠、风物特色,皆通过贡赋的形式纳入王朝政治



地理空间,被赋予了秩序“坐标”。以地方表述事物,正是“辨方正位、体国经野”<sup>[30]</sup>之空间政治、方位律制、天下秩序、人伦礼序在物象上的“投影”。

《禹贡》以九州方域涵括天下事物,其舆地类序的疆域地理思想在《汉书·地理志》中得到进一步确立,并被后世诸多地理志书奉为圭臬。官修史志如《新唐书·地理志》《宋史·地理志》,多以府、州、县为单位,记述各地的区划沿革、人口、风土、物产、贡赋等。就陶瓷贡赋而言,《元和郡县图志》《新唐书·地理志》《元丰九域志》《宋史·地理志》《宋会要辑稿》等文献中,都记载有地方向中央进贡瓷器的情况,比如唐代的河南府、邢州、越州,宋代的河南府、邢州、耀州、越州、明州、饶州、定州、青州,等<sup>[31][32]</sup>。而宋代文献中出现的“官窑”,则是瓷器御贡制度走向专门化的反映。

除正统体例的志书、政书外,在文人儒士博闻广识、遣兴抒怀的诗文笔记中,亦多见对地方物产的记述。唐、宋饮茶之风盛行,品茶赏器的话题遂成为雅谈。陆羽《茶经》从品茶的角度对产自越州、鼎州、婺州、岳州、寿州、洪州、邢州等地的茶碗进行比较,特别对“邢瓷”与“越瓷”之品格作了一番风雅的比附<sup>[33]</sup>。宋人笔记中开始更多地以“窑”归类命名瓷器,“官窑”之表述也大约始见于这一时期。周煊《清波杂志》辑录了有关汝窑以及定、饶、越、耀等地瓷器的见闻<sup>[34]</sup>。周密《武林旧事》记述了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清河郡王张俊向临幸的宋高宗进奉汝窑酒瓶、洗、香炉等物一事<sup>[35]</sup>。元陶宗仪《辍耕录》引南宋叶真《坦斋笔衡》所记,接连言及“越窑”“定窑”“汝窑”“龙泉窑”“官窑”“内窑”“乌泥窑”“余杭窑”诸窑雅闻轶事<sup>[36]</sup>。不难看出,文人笔记对各地陶瓷的描写,一方面承袭了滥觞自先秦兴盛于魏晋的博物洽闻传统,“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笑”<sup>[37]</sup>;另一方面,受经学、理学观念影响,也力图将博雅通识与正经补史相结合,将知识纳入儒家经典思想教化体系,如吕大临《考古图》所言:“觀其器,誦其言,形容髣髴,以追三代之遺風,如見其人矣;以意逆志,或探其制作之原,以補經傳之闕亡,正諸儒之謬誤。”<sup>[38]</sup>在“崇道黜器”的主流观念之下,诗文笔记中谈论器物,多重说理,轻述技。是故以地方之“名”比附陶瓷之“类”,其旨趣多不在于深究具体产地所在,而更侧重通过多样的“风格”去品度揣摩事物之“道理”。所谓观物取象,格物明理,即“以物之象”去“附会、附和、求知、求是”,以达致对“义理”的理解和实践<sup>[39]</sup>。

明清笔记总体来说延续了上述思想特质,且更为系统地对各窑风格进行归类、比较、评辨。如明初曹昭所撰《格古要论》,对宋元时期常见的十多类窑器以及高丽窑、大食窑的特点加以罗列品鉴,“格其優劣,別其是非……辯其眞贗,正其要略”<sup>[40]</sup>。《清秘藏》《遵生八笺》《瓶花谱》《长物志》《留青日札》《事物纪原》《博物要览》《骨董十三说》《南窑笔记》等著述,也从各自不同的鉴赏眼光出发,对古今各窑器物之高下、精粗、雅俗排列座次,划分品第,或以若干“大窑”“名窑”加以并称。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后期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兴起,愈发重视知识实用性的陶瓷类专论开始出现,如明末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埏》,清代朱琰《陶说》,兰浦《景德镇陶录》等。此类著作往往不拘泥于对历史“名窑”“古器”证经数典式的论说,而开始倾向于对现实中的产地、工艺作求真务实的考证,“以亲见之事,参诸旧闻”<sup>[41]</sup>。如《南窑笔记》特别介绍了今人对古窑的仿制手法<sup>[42]</sup>,《景德镇陶录》则对全国各地、各郡县的四十七处古今瓷窑作了较详实的考释<sup>[43]</sup>,可谓开近代陶瓷研究风气之先河。

## 四

近代以降,以“求真”为终极目的的科学物质观渐渐主导了人们对事物的理解认知,其认识论源头,可追溯至古希腊柏拉图对“可见世界”与“理念世界”的区分,以及由此导致的对直观可见现象的不信任和对“抽象”的追求,这种观念显然与中国古人“观物取象”的求知问学方式大异其趣。彭兆荣指出,在当代人的思维中,“抽象”几乎已成为一种“认知霸权”<sup>[44]</sup>。然而一个颇令人玩味的现象是,在中国陶瓷文化相关的知识生产场域,却始终呈现出明显的话语杂糅:一方面是对传统观念中事物范畴、秩序、价值、意义的承继以至推崇;另一方面,则力图采取一种去语境化的、数理形式化的普遍主义认识论取向。

中国现代意义上考古学的形成伴随着一系列西学理念的传入,古生物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等手段先后被应用于古物发掘,将田野工作获取的一手材料与科学的类型学方法相结合,构建起对器物年代和分布的知识,比如美国留学归来的李济就主张“考古遗物的分类应以可定量的有形的东西为基础”<sup>[45]</sup>。在新观念传入的同时,中国传统文献中约定俗成的、以“窑”为核心的表述与分

类体系,在陶瓷研究领域也始终占据着一席之地。张光直指出,中国考古学有三个渊源——传统的古器物学、西方考古学以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sup>[46]</sup>。而历史学者芬雷(Robert Finley)则认为,今日中国考古学界对新出土陶瓷的分类与阐释方法,仍然深受宋人所立下的典范观念影响<sup>[47]</sup>。事实上不止是考古学,几乎所有与中国陶瓷相关的“物质”或“非物质”文化研究领域,特别是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解释学立场影响,倾向于将“物”置于具体社会文化语境中去理解的学科,如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遗产学、博物馆学等,几乎都绕不开“窑”这一概念坐标。

20世纪初,来华的外国人日渐增多,他们对包括陶瓷在内的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收藏研究热情也愈发高涨,并开始尝试对窑址进行实地勘察发掘。然而古陶瓷与早期欧洲博物学家所热衷搜集的“自然物”有所不同,其作为“东方艺术品”的价值建基于传统器物学的分类知识,其意义阐释有赖特定语境,从而无法像林奈对待“自然物种”那样采取机械自然主义的分类模式。为了凸显古瓷的价值,西方人在对其分类时,多依循历代典籍中“窑”之表述,将新发现的器物与传统类型进行比照,并以一种淡化具体产地的模糊方式对相似器物加以归类。如20世纪20年代,英国人赫勃逊(R. L. Hobson)在其论文中,把产于中国北方地区、具有某些共同特征(比如都施白色化妆土)的瓷器统称为“磁州窑型”(Tz'í-Chou type wares)<sup>[48]</sup>。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多次来华考察的日本学者三上次男,也在日后出版的《陶瓷之路》一书中反复使用了“越州窑系统”“龙泉窑系统”一类表述<sup>[49]</sup>。

近代西方人在华从事的考古活动,客观上带来了两方面影响:促进中西学问的碰撞交流以及激起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叶麟趾等前辈率先走出书斋、踏足田野,对瓷窑进行实地考证并初步探明了一些重要窑址所在地。随着经验研究的普及,约自20世纪50年代起,学者们在调查报告中开始有意识地使用诸如“类型”“系统”“瓷系”“窑系”等概念<sup>[50][51]</sup>,梳理辨析新发现的大量窑址,并尝试厘清其与古代文献中所记载的“窑”之关联。

在古今中西学术话语的“并接”实践中,中国人对于人地关系的浓厚兴趣一直延续下来,并在新的研究范式——考古学与地质学、古生物学的合作中得到进一步彰显。一方面,科学的发掘与分析手段的采纳使学界对窑址的重视程度空前提

高,对陶瓷产地和年代的认知愈发倾向于寻求“精确性”;另一方面,受到与考古学和物质文化研究有着深厚渊源的欧陆民族学和北美人类学影响,在“文化圈”(kulturkreis)<sup>[52]</sup>、“文化区”(cultural area)<sup>[53]</sup>等概念启发下,考古学开始谋求以更系统的文化理论来统摄新发现的窑址和器物,并解释其中的播衍、流变规律。在力图达致“精确”认知与得出更具“普遍性”规律的认识取向中,“窑”这一概念,遂衍生出了“窑址”“窑口”“窑系”等多重表述样态。刘毅认为,“窑”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至少有三种不同层面的指涉:一是指生产陶瓷器的某一处具体窑炉及作坊等相关设施,强调的是具体的生产单位;二是指若干地域相近的窑炉或窑场组合而成的一片制瓷业聚集区,亦即窑场,应用于古陶瓷产地判定时也写作“窑口”,这是一个集中的、有一定地域范围限定的概念;三是指更大范围的、生产的产品品种相同或近似的若干窑场的总和,即通常所说的“窑系”<sup>[54]</sup>。

需要说明的是,在今日有关陶瓷的研究领域,关于“窑”这一概念的“适当性”与存废取舍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窑”在中国陶瓷知识生产实践中所持续发挥的影响,早已超越了学术界本身。藉由“窑”这一表述方式,我们不难体味出凭附于其上、在时空中点滴积累与嬗递的中国人对于“人一地一物”关系的独特理解和感受。

古往今来,人们的陶瓷生产活动从未停止,关于物质与空间的观念也在持续变迁,诚如一些学者所言,“窑”“窑系”等概念所反映出的是“瓷业发展的渊源流变关系”,它们“既非一成不变,也不是无法再行分别的一个整体”<sup>[55]</sup>。事实上,无论将“窑”看作是世间存有之物抑或是关于事物的理解与认知方式,借用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话来说,都是一个“在行动中以历史的方式被再生产出来”,同时“在行动中被以历史的方式改变”的过程<sup>[56]</sup>。正是通过知识与物质生产者们的持续操演实践,“窑”在展现意义的同时也不断生发出新的意义。

#### [参考文献]

- [1][2][3][4][5][7][8]许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731,731,224,735,344,344,344.
- [6]毛亨,郑玄,孔颖达.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980.
- [9]魏宜辉.说“甸”[A].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辑[C].北京:中华书局,2012:633-640.
- [10]尉缭.尉缭子全译[M].刘春生,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 社,1993:64.
- [11]马骥.绎史[M].王利器,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2:24.
- [12][29][30]郑玄,贾公彦.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060-1061,35-38,3-4.
- [13]宋应星.天工开物[M].潘吉星,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86.
- [14]许之衡.饮流斋说瓷[M].杜斌,校注.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3.
- [15]熊海堂.东亚窑业技术与交流史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26-31.
- [16]Polanyi M. Personal Knowledge[M]. London: Routledge, 1958:53.
- [17]司马光.类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467.
- [18]迪维斯.欧洲瓷器史[M].熊寥,译.杭州: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1:21.
- [19]Jordan-Gschwend A. Rarities and Novelties [A]. Jackson A. & Jaffer A., eds. Encounters: The Meeting of Asia and Europe, 1500-1800[C]. London: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2004:34-41.
- [20][22][47]芬雷.青花瓷的故事[M].郑明萱,译.台北:猫头鹰出版,2011:169,94,148.
- [21]Durkheim E. & Mauss M. Primitive Classification [M]. Needham R., tr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8-11.
- [23][24]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M]. Springfield: Merriam-Webster Inc., 1985: 916, 392-921.
- [25]Cresswell T. 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M].徐苔玲,王志弘,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14.
- [26]彭兆荣.人类学视野中“地理的地方”与“地方的地理”[J].贵州社会科学,2011(6).
- [27][28]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32,132.
- [31]王光尧.中国古代官窑制度[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28-39.
- [32]熊寥,熊微.中国陶瓷古籍集成[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3-6.
- [33]陆羽.茶经[M].沈冬梅,编.北京:中华书局,2010:65.
- [34]周焯.清波杂志[M].刘永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 213-215.
- [35]周密.武林旧事[M].钱之江,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196.
- [36]陶宗仪.南村辍耕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9:362-363.
- [37]李肇.唐国史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3.
- [38]吕大临,等.考古图(外六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95.
- [39][44]彭兆荣.物·非物·物非·格物——作为文化遗产的物质研究[J].文化遗产,2013(2).
- [40]曹昭,王佐.新增格古要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5:1, 154-158.
- [41]朱琰.陶说[M].杜斌,校注.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 231.
- [42]张九铎.南窑笔记[M].王靖,点校.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1-29.
- [43]兰浦,郑廷桂.景德镇陶录图说[M].连冕,编注.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159-195.
- [45][46]张光直.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J].陈星灿,译.考古与文物,1995(3).
- [48][51]秦大树.论“窑系”概念的形成、意义及其局限性[J].文物,2007(5).
- [49]三上次男.陶瓷之路[M].胡德芬,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44,146,209,218,228.
- [50]蔡小辉.也谈“窑系”——兼谈古代名瓷被仿烧问题[J].东南文化,2005(3).
- [52]Graebner F. Kulturkreise und Kulturschichten in Ozeanien [J]. 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 1905, 37(1).
- [53]Kroeber A. L. The Cultural Area and Age Area Concepts of Clark Wissler [A]. Rice S. A., ed. Methods in Social Science [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1: 248-265.
- [54]刘毅.论“窑系”[A].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八辑[C].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155-166.
- [55]任世龙.论“越窑”和“越窑体系”[J].东南文化,1994(增刊1).
- [56]萨林斯.历史之岛[M].蓝达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3.

[责任编辑:邵卿]